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魏后凯

●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能够奠定中国现代化的基石，也将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会更加完整和牢固。

● 我们要立足特殊国情、具体农情和时代背景，回答好发展什么样的农业、怎么发展农业等一系列问题，找准着力点，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推云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这为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就业人数和增加值规模都居世界首位。从全球范围看，要实现涉及数亿农民的农业现代化，至今尚没有先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能够奠定中国现代化的基石，也将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必然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比较概念，既是推动传统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的过程，也是不断赶超农业现代化先行国家的过程。其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重要标志是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水平和科技含量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孜孜追求的重要目标。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把农业现代化摆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明确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当时人们把农业现代化主要理解为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和良种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战略转型和体制转轨，农业现代化在建设中逐渐被赋予科技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融合化、绿色化、智能化等丰富内涵。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方向。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这一道路进行了具体化，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将这一道路阐释为“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农业现代化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任务。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实现

农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成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其科学内涵，既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又要从中国国情农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道路。

一要把握“大国小农”特征。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目前，通过土地流转经营3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其他均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小农”范畴。这种小农户将会长期存在。将小农生产有效引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走“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二要把握基本制度特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一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坚持并不断丰富完善。三要把握发展阶段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任重道远。深刻把握基本国情特征，我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道路，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推进战略。这种战略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多目标协调。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粮食消费量巨大，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国之大者”，也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底线要求。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又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绿色发展，实现多目标的统筹协调。二是多主体协同。既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要创新体制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全面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政府、市场和农民协同互补形成发展合力。三是多路径并举。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适应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

变化，大力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推动农业向良种化、机械化、规模化、融合化、工业化、社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四是多模式并存。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发展条件和特点千差万别，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梯次推进，探索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形式，走多元化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世界意义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农业现代化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即以美国、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规模化农业模式，以日本、荷兰等为代表的精细化农业模式，以及以法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高值特色农业模式。这些模式尽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拥有数亿农民，“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立足自身国情，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模式和理论创新，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世界农业现代化理论。这一道路还将为世界农业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了世界农业生产率增长，为加快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中的数据，2019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约为5609美元(含农林渔业，2015年美元价)，比1991年增长了约4.87倍，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约1.80倍，中国所在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增长了约3.25倍。这期间，若以世界平均水平为100，中国农业生产率相对水平由66.3%提升到139.0%左右；若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为100，中国农业生产率相对水平由67.2%提升到92.8%左右。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对世界农业生产率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发展阶段，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和世界的农业生产率，由此加快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中国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到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按稻谷和小麦计算的口粮自给率近年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95%，确保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还要看到，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绿色兴农，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加快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推动农业减排固碳和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和强度持续下降，而利用率则不断提升。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加快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农业绿色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确保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将有利于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2020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仍有5亿人左右，农业及相关产业就业总量规模大、所占比重高。加快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将意味着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增收贡献率，由此将增进中国农民福祉，促进世界总体福祉水平的提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延伸至以农业为核心、农民为主体、农村为载体、城乡协同实现现代化的一体化过程，外延拓展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现代化的有机系统。我们要立足特殊国情、具体农情和时代背景，回答好发展什么样的农业、怎么发展农业等一系列问题，找准着力点，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业农村依然是“四化同步”的突出短板。我国现有2亿多农户，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和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禀赋特征仍将长期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业基础薄弱、竞争力不强，农民持续增收动能不足，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这些仍然是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短板问题。

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社会转型、消费升级等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出更高需求，但农业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尚未能同步调适，“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进一步看，外部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给农业系统安全性和产业链韧性带来新挑战。传统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方式面临挑战，供应链断链、结构性短缺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大隐患。如何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建立更稳定的、有韧性的、可抗冲击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以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为基本前提，以实现食物安全、营养健康、绿色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安全保障力、产业控制力和市场竞争力为核心，重点从四个方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筑牢粮食安全基本盘，端稳中国人饭碗。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大特色和底盘就是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重心要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基础上，统筹考量口粮、非口粮食物、饲料作物的供需结构关系，以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调配关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方针，深入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耕地保护、加大投入、技术支撑等方面综合施策，提高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同时，利用好国际市场，探索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多源头、多渠道、多品种的全球农业资源利用模式和供应体系。

推动“三链”协同升级，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推动农业产业链、创新链、利益链协同升级。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产业功能，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新型服务业与乡村信息业深入发展，促进康养、休闲、电商等业态模式创新。提升创新链，将科技全方位深度植入产业链，加快生物种业、智慧农业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自主攻关，推动现代生物技术、设施装备、数字化技术等精准化应用与示范。完善利益链，健全现代农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为此，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保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切入点，发挥其公共服务和辐射带动能力，赋予更多资源统筹的自主权，形成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加快推动城乡双向开放，强化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设计，破除限制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壁垒，促进城乡要素良性循环。

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农业产业链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产业链韧性是经济韧性的关键，决定了农业抗风险能力。为此，要搭建国家粮食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平台，遵循“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分级控制”的思路，全面构建“全产业链风险—全过程管理—多层次联动”的风险管控体系。同时，建立风险管控联动和共治响应机制，健全国家、省、市、县多级协同管控，各区域合作联动，多部门联合会商的粮食安全风险报告制度、风险研判机制和共治共享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jirbll@sina.com

在同步发展中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

涂圣伟

任何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农业现代化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具体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什么方式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往往由其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来推进现代化不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我国必须依靠“并联式”发展同步推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协同发展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依存、互为支撑。如果将工业化看作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则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将工业化狭义理解为发展制造业，就容易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分割而难以同步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客观地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使农业现代化受到一定影响，这是由当时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农关系逐步调适，并朝着更加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速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同时改革效应不断扩展，乡镇企业成为生机勃勃的经济新生力量，农村工业化由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源源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低成本的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工业化加快发展，反过来又为农业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要素循环、商品交换更加顺畅，工业化与农业现代

化相互支撑、有效协同的局面加快形成。

当前，我国正在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农业现代化的势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断蓄积后，随着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协同发展，一个关键着力点是优化产业部门之间的要素配置，特别是将工业化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物质装备、社会化服务等工业化成果更加广泛地应用到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中，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有很大发展潜力，多功能性开发也有很大空间，要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协同发展的有效结合点。通过加强融合主体培育、有效市场建设、基础服务体系构建，全面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促进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城镇化相互协调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如果就此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认为城镇化会消灭农业农村，又或农业农村将越来越不重要，就难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谬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即便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我国仍会有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这决定城镇化建设不能以荒芜的乡村、萎缩的农业为代价，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通过简单地限制城镇化发展来实现，二者应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实地看，如果依然延续传统城镇化模式，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不断汲取农业资源要素，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很难协调起来。为此，必须加快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型。高质量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具有更强的共生关系。我国人均耕地面积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超小规模经营且面临资源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如果城镇化质量不能加快提升，农业人口无法有效转移、有序落户，就很难腾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空间，农业边际产出和收益就难以提高。同时，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高质量的城镇化也很难推进。无论是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消费需求，还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三农”的“压舱石”“稳定器”作用都极为重要。

当前，促进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核心依然在优化人地关系，实现城乡人口流动与土地权益流转的高效匹配上。一方面，完善“人地挂钩”相关政策，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后顾之忧地进城落户，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健全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让更多人才投身农业。此外，发挥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纽带的关键作用，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为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产业协同发展提供重要载体。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主要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后才进入信息化阶段，而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加快推进阶段就迎来信息化大发展，这为其赶上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提供了重要动能。回望历史，前几次科技革命最先引发工业体系的颠覆性变化和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巨大转换，然后再向农业农村领域传导、渗透。与此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时空距离，让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几乎同时、同步享受到技术进步红利。

从实践看，当前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

的融合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千百年来我国传统农耕场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促进了农产品供需精准匹配。甚至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方面，信息技术也展现出积极作用。反过来，农业发展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可以从两个层面进一步拓展。一方面，只有在促进农业实体要素变革的情况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生产力。为此，应加强数字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的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加快数字化终端设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素质素养，促进农业资源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和时间上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生产力需要数字化生产关系与之匹配。应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革新农业生产关系。比如，依托电商“反向定制”等塑造农业生产组织新模式，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总体看，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才能更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